

主编

李匡武

副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中国 遇 史辑

两汉

魏晋

南北

朝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逻辑史

(两汉魏晋南北朝卷)

李匡武 主编 周云之 周文英 副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41,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45

ISBN 7-226-00280-9/B·17 定价: 3.15元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匡武

陈孟麟

沈劍英

周云之

周文英

全书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森

孙中原

朱志凱

刘培育

李元庆

何应灿

李建钊

陈正英

陈孟麟

沈劍英

张清宇

周 山

周云之

周文英

郑伟宏

欧阳中石

崔清田

高振农

高银秀

董志铁

杨俊光

葛黔君

蔡伯铭

中國邏輯史

歐陽中石題



《中國邏輯史》編輯委員會

主編

李匡武

副主編

周云之 周文英

編委

（按姓氏筆畫為序）



本卷责任编辑委

刘培育

本卷撰稿人

刘培育

李建钊

蔡伯铭

引 言

本卷探讨两汉魏晋南北朝近八百年的逻辑发展史。

在先秦，中国古代逻辑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赢得了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印度因明鼎足而三的光荣地位，成为世界古代逻辑的三大源流之一。

秦以后，中国古代逻辑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下面，先分别叙述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逻辑发展概况，然后简单说明我们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逻辑发展史的几点认识。

一、两汉时期的逻辑发展

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年）经过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之后，于公元前202年统一了全国，建立了西汉。汉初，统治者尊奉“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发展经济。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在思想领域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限制了逻辑学的正常发展。董仲舒（前179～前104年）创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进而把逻辑变成论证反动神学的奴婢。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前6～公元57年）“宣布图讖于天下”，以讖断礼，以纬俚经，经学笺注与讖纬神学相结合成为官方学术和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进一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逻辑发展的肥沃土壤。但是，先秦名辩的流风余绪尚存。特别是由于科学的进步和农民武装起义对统治阶级的打击，反讖纬

神学的思想斗争日益发展。以王充（27～97年）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在批判谶纬神学的斗争中发展了论证逻辑和归纳逻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淮南子》的逻辑思想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年）主持撰写《淮南子》，作者们对名辩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坚持“循名责实”的观点，强调知名而不知实犹如盲者只能说色而不能辨色一样，是毫无实践意义的。他们肯定从“见者可以论未发”，（《汜论训》）认识到部分和整体之间具有某种确定关系者能够推论。但是，他们更为注意推类失误的一面，继《吕氏春秋》之后，再次强调“类不可必推”。（《说山训》）他们指出，推类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同异关系的复杂性，要解决“若非而是，若是而非”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事物的具体因果关系。《淮南子》响亮地提出：“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说山训》）尽管《淮南子》的作者们没有对事物的因果关系做出典型的分析和深入的理论探讨，但他们所指出的探索事物因果关系的方向，却推动了后世对古代归纳逻辑的研究。

董仲舒的神学逻辑 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给儒学蒙上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逻辑也成了他论证神学的工具。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里描绘了一幅神学的概念生成论。他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认为名是天意的表现。名被董仲舒抬上了天，然而它却失去了反映实的深厚基础。他还用主观的神秘的方法解释概念和比附事物，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神学逻辑。董仲舒对概念理论也有积极的贡献。他指出：“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深察名号》）说出了号外延大、内涵少，名外延小、内涵多的道理，这是很可贵的。

先秦名辩的流风余绪 先秦儒墨并称、名学瞩目的局面在汉代不见了。但是，先秦的名辩思想，秦火焚不尽，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也一直流传着。司马谈（？～前110年）、司马迁（前145～前86年）父子作为太史，遍读内府秘书。司马谈把先秦诸子分为六家，列名家为六家之一。他说，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六家要旨》）肯定了逻辑学的重要性。司马迁作《史记》，虽然没有为名家、墨家人物单独列传，却在孟荀列传中提到公孙龙和墨翟。他说：“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墨翟……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司马迁称公孙龙为“剧子”（巨子），指出社会上多有墨子其书，可见名、墨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此外，老庄、申韩、孟荀以及阴阳家的列传中都比较客观地保存了先秦名辩的大量宝贵资料。西汉刘歆（约前50～公元23年）提出先秦诸子皆出于王官说，认为名家“出于礼官。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诸子略》）刘歆的本意也许是为孔子脸上增光彩，但在儒学独尊的年代里，他把名家同孔子联系起来，客观上也起了抬高名家的作用。

扬雄的逻辑思想 两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著作。科学是理论思维的结晶，而理论思维的成果必然又要推动思维理论的发展。生活在西汉末和新莽时期的扬雄（前53～公元18年）不满意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公开予以批判。他重视理性，强调人要独立思考，他自己就是位“默而好深湛之思”的思想家。同时他又强调效验，认为“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法言·问神》）扬雄否定神造万物之说，试图用数量关系来说明万

物阴阳消长的规律，表现出数的演绎系统的萌芽。

王充的论证逻辑 东汉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逻辑家王充，继承扬雄等人的批判精神，吸收当时科学成果，以冷静的理智之光和澎湃的愤懑之情，用大量事实和严谨的逻辑论证，批判谶纬虚妄之说，宣扬真理。他自觉地运用逻辑这一思想武器，提出要通过论证而达到辨真伪、正真是、疾虚妄的目的。王充说：

“论说辨然否”，（《论衡·自纪》）“是而直者为胜”，（《物势》）指出论证是分辨一个论断真伪的思维过程，只有论断真，并且论证方法正确，论题才能被确立，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论证的逻辑性质。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阐述了论证的要求和方法。他特别总结了谬误的多种表现形式，分析了产生谬误的原因，提出了反驳谬误的要求和办法。比如他指出，不能“失对上之指，违道理之实”；（《刺孟》）

“前后相伐”，“不能皆是”（《问孔》）等，都具有规则的意义。王充已经初步建立了论证逻辑体系，他对归纳理论也有重要贡献。《论衡》是中国逻辑史上的光辉篇章。

王充的论证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东汉末期的思想家，如王符（85～162年）、荀悦（148～209年）、徐干（171～218年）、仲长统（180～220年）等，在对东汉政治的批判中都发扬了王充的思想。他们以“明真”为目的，（徐幹：《中论》）以真实为“万事之概量”，（荀悦：《申鉴·时事》）强调“事莫贵乎有验，言莫弃乎无征”。（《中论·贵验》）徐幹给论辩下了新的定义：“辩之为言别也，谓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中论·核辩》）王符对譬喻提出了新的见解：“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潜夫论·释难》）此外，东汉末思想家把逻辑名实的讨论，引上了正名位、讲人伦和人物

品评的轨道，也是一个新的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逻辑发展

在中国逻辑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有鲜明特点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汉代进步思想家的理论批判和农民起义的武装打击下，进入魏晋时期，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桎梏被冲破，搢绅博士意识动摇，繁琐的章句经学衰微。魏文帝曹丕（187～226年）推行九品中正制，人物品评一时成为重要问题。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强宗豪门之间残酷杀戮，“名士少有全者”，一些名士远离时务，清议雅谈。这一切造成“玉柄麈尾”的名流精神发抒，谈玄辩理之风大盛。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汉代思想禁锢的一个解放。谈辩离不开逻辑技巧，魏晋南北朝继战国之后出现了新的名辩高潮。

魏晋南北朝的谈玄辩理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辩理蔚然成一时风尚，其主要表现是：

1. 不择场合，名士相遇则共谈。据记载，裴遐娶王衍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郭子玄在座，“挑与裴谈。”^①又，卫玠拜见大将军王敦，在那里遇见谢幼舆，二人“逐达旦微言。”有时干脆找上门去共谈，比如“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

2. 不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比如，少年王弼听说吏部尚书何晏“有位望，时谈客盈坐，……往见之。”何晏早闻弼名，便与之相难。

3. 不辩则已，一辩便废寝忘食，甚至笃病不起。据载，孙盛与谢浩共谈，“往返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此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又如谢镇西病刚好，与林道人“讲论”，“遂至相若。”其母王夫

^①见《世说新语·文学》，下同。

人一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无奈，王夫人流着眼泪亲自出来说情：“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这才“抱儿而归。”卫玠身体“素羸”，与谢幼舆共论，“于此病笃，遂不起”。

4.许多谈辩不管内容，不问是非，意在取胜。许掾与王修“论理”，“苦相折挫，王遂大屈。”然后许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复疏，王复屈。”又，羊孚与殷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见同”？乃至“四番一通。”又，支道林与许掾相辩，“支通一义”，“许道一难”，四座“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四座”者，可能是欣尝谈辩的观众，也可能是裁判。《世说新语》中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

魏晋的谈玄论理，几乎是名士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名士时贤们比赛论辩技巧的一种游戏，胜者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它也可能是一种自觉的逻辑训练。据记载，何晏拿一条“胜理”让王弼去破，“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胜理”可能就是在多次论辩中取胜的论题或论式。

刘邵和嵇康的逻辑思想 刘邵（171~245年）认为：“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人物志·序》）只有知人善任，才能“兴绩”，“成天功”。在汉末人物品评思潮的基础上，刘邵把人物名实学推向高峰。他所谓的名，即名号，官职；实，即人的情性与才能。他强调要根据人的不同情性、才能给以不同的名号，授予不同的官职，要通过对实的考察，达到名实一致。刘邵把名实讨论引到人物品评上去。他认为，善辩是才能高的一个标志，诘难是辨明是非的必要条件。他说：“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其由也。”（《材理》）他

还总结出论难的许多具体要求。在中国逻辑史上，刘邵最早提出论辩者应该具备的思维素质和逻辑才能是：“聪能听序，思能见端，明能见机，辞能辨意，捷能摄失，守能待攻，攻能夺守，夺能易予。”（同上）其内容涉及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证明和反驳），思维方法以及语言等多个方面，标志着人们对逻辑的认识的深化。

嵇康（223～262年）是魏晋时期的谈辩大家。他总结论辩经验，提出许多重要的论辩原则和方法。比为：“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声无哀乐论》）；“顺端极末”，以纲带目；（《明胆》）“矛戟”之论，不能“并通”，（《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等。

王弼和欧阳建的言意之辩 言意关系的讨论，早在先秦就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言意之辩达到高潮，这同人物品评有密切关系。人的才能包括言谈和气质、风度、精神等因素。言谈和气质、精神有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这就有了言和意的关系问题。魏晋人喜研老庄和周易之学，其中也有关于言和意的题目。当时，魏晋玄学家多数人主言不尽意论，代表者是王弼。欧阳建主言尽意论。

王弼（226～249年）提出“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和“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两个命题，并做了比较深刻的论证。他强调名言是得意的工具，得意才是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概念方面，他指出：“名生乎彼，称出乎我”，“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老子指略》）似乎猜测到概念和名称的不同，并且表述了概念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部性质的思想。然而王弼对此缺乏逻辑的自觉性，他夸大言和意的区别和对立，由“名必有所分”推论出“言之者失

其常，名之者离其真”（同上）和不忘言则不得意的错误结论。

欧阳建(约267~300年)独倡“言尽意论”。他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提出并正确地论证了“名于物无所施”，“言于理无所为”；物“非名不辩”，理“非言不畅”和“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参见《言尽意论》）等重要命题。但是他夸大了言和意的一致性，得出名物无不相符，言理无不相称，而不得相离为二（“言无不尽矣”）的结论。这个结论，把话说过头了。

刘徽的逻辑思想 刘徽的《九章算术注》（三世纪问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逻辑最高成就的代表。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不仅是解释《九章算术》中的疑难问题，而且要着重探讨《九章算术》诸公式、法则成立的根据，因此书中有大量的推理和证明。他说：“事类相推，各有攸归”。（《九章算术注·序》）又说：“触类而长之，则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同上）注文中的推理绝大多数是演绎的等式推理，也有以类求故，以故成理的归纳推理。书中的证明，主要是“析理以辞”和“解体以图”两种方式。前者是用一系列判断去分析公式和法则的成立根据，后者是用抽象的论证性的图形（包括平面图形和立体模型）去揭示公式和法则成立的根据，都初步具备了逻辑证明的结构。刘徽的证明都是直接证明。注文中也有反驳，其反驳都是间接反驳。

刘徽改变了《九章算术》对数学概念的涵义泥守约定俗成的惯例，主要从形成或构成上对许多重要的数学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这些定义基本上符合今天逻辑学关于定义的各条规则。

鲁胜和《列子》对先秦名辩的研究 随着“儒学一尊”局面的被冲破和玄谈之风的盛行，先秦名辩思想重新受到思想界的重

视。名辩和玄谈是互相促进的。西晋著名逻辑家鲁胜，一生用很多精力研究先秦名辩学，撰写了《墨辩注》和汇编了《刑名》两篇。在仅存的《墨辩注叙》中，他对先秦名辩学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他提出了对先秦名辩思想的演变和师承关系的看法，肯定《墨辩》标志着古代逻辑的创立；概括了先秦逻辑论争的六个问题，即形名之辩、坚白之辩、有厚无厚之辩、两可之辩、同异之辩和是非之辩。尽管鲁胜的总结还有不够准确和不够完备之处，但《墨辩注叙》仍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光辉的逻辑史篇章，从中可以觉察出他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史料取材、目的、任务等观点，这些对当代中国逻辑史方法论的研究，仍有参考价值。

魏晋人撰写的《列子》一书，假托乐正子舆与公子牟的对话，对先秦名辩思想作了非常有趣的评论。乐正子舆作为公孙龙的反对派的代表，把公孙龙和辩者的诸多论题判作诡辩而进行指责。作为魏晋玄学家代表的公子牟则对乐正子舆的指责逐条作了反驳，他明确地指出：“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子（乐正子舆）不谕至言而以为尤也，尤其在子矣。”（见《仲尼》）这说明，公孙龙和辩者们的一些论题及思维方法，如果说在先秦因许多人不理解而遭到指责的话，那么到了魏晋则认为这些论题不仅是理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了。据说，爰俞因“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少有能名。”^①可见魏晋人接受了公孙龙等辩者的辨析入微的思维方法。

陆机和葛洪的连珠 连珠肇于韩非（约前280～前233年），经扬雄而逐渐发展，到两晋达到高峰。西晋陆机（261～303年）和东晋葛洪（284～364年）是制作连珠的两大巨擘。

^①见《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引语。

连珠（演连珠、连珠体）过去主要是作为文体来研究的，其实它也是一种推论形式。连珠有大体整齐的格式，一般为二段或三段。从逻辑看，都有前提和结论，并有相应的联结词以显示各段之间的推论关系。比如，二段连珠，单独用“是故”或“故”、“是以”连接前提和结论；三段连珠用“是以……，故……”或“何则……是以……”等表示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联，因此都是推论式。这种推论式常常表现为演绎、类比、归纳各种形式的综合运用，其中类比或譬喻往往不可少。从古代大量连珠的结构看，它有可能是魏晋人把逻辑推理形式化的一种尝试，因此值得逻辑史工作者去认真研究。

刘勰与名辩和因明 刘勰（约465～约532年）是南朝齐梁时代最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逻辑学家。他在不朽的著作《文心雕龙》中，对言意关系的讨论做了总结。他说：“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神思》）意思是由于作家语言表达能力的高低不同，思（心）、言（辞）、意（神）三者既可以非常合谐一致，甚至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也可能疏漏到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地步。刘勰充分肯定言可以尽意，“枢机（语言）方通，则物无隐貌”，（同上）又承认有“言外之意”，“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同上）他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以喻其真。”（《夸饰》）他认为，对于那些最微妙的抽象道理，人们不能直接用语言去准确地“描摹”，但是用壮伟的言辞对事物做夸张的描写，却不仅能够真实地表现事物的形貌特征，也能鲜明而真实地显示事物的本质。总之，刘勰认为“道”是可以认识的，也是能够表达的。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王弼和欧阳建等人的两个片面性，把言意关系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刘勰在《刘子新论》中对名实关系的讨论做了总结。他指出，名和实是不同的东西，但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名源于实，又可以“订实”。辨实是目的，而“有实无名则实不可辨。”“信名而略实”，则得不到实。因此聪明的人，“执名以责实”，达到名正而实辨，即“名实俱正。”（《审名》）

刘勰生活在印度因明初传中国的时代。他早年在南朝佛学中心——定林寺整理佛典，钻研佛学，接触到因明。这从《文心雕龙》的体系安排和具体论证上都可以表现出来。

三、对两汉魏晋南北朝逻辑发展的几点认识

第一，秦以后，中国古代逻辑是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发展的。其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却从来没有亡绝过。这是因为，名辩在先秦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著作很多，影响深远；同时，名辩作为思维和表达的工具，各门科学都要用它，各种著作里都少不了它。正如鲁胜所说，有的人起劲地反对名家和名辩学，但他的言谈、撰述仍不能违背名辩学的要求。因此，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比如科学的进步，出现自由讨论的空气等，逻辑就会很快地活跃起来，产生出新的成果。

第二，两汉魏晋南北朝逻辑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吕氏春秋》之后，《淮南子》的作者们继续把逻辑眼光集中在推类所发生的失误上，进而思考演绎和类比各种论式的适用范围，注意推类前提的真实性问题。他们指出探讨事物的因果联系的极端重要性，推动古代逻辑家去研究归纳推理的问题。整个两汉时期，以“验证”为主要内容的归纳逻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扬雄、王充以及东汉后期的逻辑家们无不重视验证逻辑问题，王充把归纳逻辑推到了一个新阶段。难怪有人说王充“开东方归纳逻辑之宗”呢！相比之下，在这个时期，公孙龙和墨辩的抽象细致地分析大

法有些受到冷落。惟有扬雄的数的演绎系统运用的是抽象分析方法。

到了魏晋，先秦名墨的逻辑传统重新受到重视。这不仅表现在鲁胜和《列子》的作者对名墨逻辑思想的总结和评论上，而且抽象的剖析入微的学风成为魏晋人的时尚。言意之辩是这个传统的代表。另一方面，一些逻辑家不满意脱离实际的抽象的玄远之论。他们在总结论辩的经验教训时，继续发扬求实、明真的逻辑传统。刘邵、嵇康、刘勰等人强调探求自然之理，遵循自然之道，是验证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逻辑家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但总的看来，这些贡献都比较零散，不够系统。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出象《墨辩》和《荀子·正名》那样比较全面、系统的逻辑专门著作。